



中国



图书馆人物

金晓林 乌兰山丹 陈春燕◎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人物

金晓林 乌兰山丹 陈春燕◎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图书馆人物 / 金晓林, 乌兰山丹, 陈春燕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555-1013-0

I. ①中… II. ①金… ②乌… ③陈… III. ①图书馆
学家—生平事迹—中国 IV. ① K82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4038 号

中国图书馆人物

ZHONGGUO TUSHUGUAN RENWU

-
- | | |
|------|--------------------------------|
| 主 编 | 金晓林 乌兰山丹 陈春燕 |
| 策 划 | 蔺 洁 |
| 责任编辑 | 蔺 洁 王 叶 刘卫伟 |
| 责任校对 | 蔺 洁 王 叶 |
| 出版发行 | 远方出版社 |
| 社 址 |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
| 电 话 | (0471) 2236473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170mm × 240mm 1/16 |
| 字 数 | 451 千 |
| 印 张 | 30.5 |
|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1000 册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55-1013-0 |
| 定 价 | 79.8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金晓林 乌兰山丹 陈春燕

副 主 编 崔佳音 柴美丽

参编人员 杨 君 王诗然 包爱英 陈 媛

目录



第一章 古代图书馆学家

综 述	3
周朝的老子	7
春秋的孔子	14
汉朝的蔡邕	20
宋朝的尤袤	34
明朝的高儒	39
明朝的胡应麟	45
明朝的李如一	53
明朝的黄虞稷	56
明朝的焦竑	61
明朝的祁承邨	66
明朝的宋濂	72
清朝的徐乾学	75
清朝的钱曾	91
清朝的宋荦	104

清朝的孙从添.....109

清朝的惠栋.....119

清朝的鲍廷博.....125

清朝的黄丕烈.....134

清朝的徐时栋.....146

清朝的李慈铭.....154

清朝的李文田.....163

清朝的朱学勤.....173

第二章 近代图书馆学家

综 述.....181

戴志骞.....187

杜定友.....193

洪有丰.....201

黄宗忠.....213

来新夏.....223

李小缘.....228

李燕亭.....236

刘国钧·····	240
毛 坤·····	250
皮高品·····	260
沈祖荣·····	266
汪长炳·····	272
王献唐·····	280
杨昭愬·····	287
姚名达·····	293
袁同礼·····	296

第三章 现当代图书馆学家

综 述·····	309
孟广均·····	312
吴慰慈·····	324
胡昌平·····	340
马费成·····	347
邱均平·····	355
韩继章·····	368

范并思.....379

刘兹恒.....394

肖希明.....409

叶继元.....420

王余光.....432

程焕文.....445

陈传夫.....454

参考文献.....468

第一章 古代图书馆学家



综 述

中国的古籍文献浩瀚灿烂，古籍文献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除了官府采缀收藏甚富，私藏图书馆学家对藏书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私藏图书馆学家已经出现了。《墨子》中记载：“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又称：“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玄唐子见面怪之。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步见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关子，其惨至于今。翟上无君子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忆数逆午精微同归之物，既知其要臭。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

《史记》中亦有记载：“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讽也。《诗》《书》之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

到了汉朝时期，私藏图书馆学家已经较为普遍，西汉末年出现了书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专门建造私人图书馆的现象。当时一般士大夫恣籍稍厚收藏蓄书，或搜访求书尤力，复增充栋，少则数千卷，多则数十万卷，越接越胜，富夸琳琅，部次标签。或秘册借抄、奇书互赏。丹黄精勘，导原期源，对保存旧籍、是正舛伪，有功于社会。或藏书之有力者，辑刻刊行，公为天下，嘉惠后学，浙而商艇购藏典籍，翻旧刊新。这些早期图书馆学家的种种举措对古籍文献的保存、传播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他们对古代、近代乃至现代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自战国开始，各国君主出于维护封建法令之统一，曾采取过不准民间藏书，只准官府藏书的措施，到了秦、汉等朝，禁书律令依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清朝乾隆时期，虽然出现了显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智慧和毅力的《四库全书》，功绩不可磨灭，但实际上统治者借此对蕴藏民族思想的文化典籍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清剿，从而完成了清代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重要活动。许多珍贵著作失去了本来面目或绝迹于人间，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历代统治者残酷的高压政策下，一些知识分子与民间志士想方设法进行藏书活动，使得不少珍贵文献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传世孤本。值得称道的是，一些私人图书馆学家，“亦有储书貽后而责与鬻厦借人者为不孝”，有的“探藏秘阁宁饱书虫靳不借闻者”，有的视藏书为积世、守视得宣者，他们视藏书重于生靠，不能不说是私人图书馆学家的功劳。这些私家藏书多则上万卷，甚至数万卷，少则也有数百卷。例如中国唐朝著名图书馆学家韦述家中聚书有两万卷，宋朝图书馆学家宋敏求藏书有三万卷，晁公武藏书有两万四千五百余卷，等等。这些图书馆学家对图书精心收藏、妥善保管。他们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首先就体现在对文献典籍的保存与流传上面。

在中国古代，书籍一经移写、传刻，难免发生夺字、误字、衍字、倒字，甚至有意地窜改等种种情况。传抄、翻刻得愈多，产生的讹误就愈甚。甚至有些坊肆书商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对某些古籍在版本上做手脚，企图以假乱真。例如，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个刊本《云间杂识》共有八卷，只残存卷一、卷二、卷三，当时的书商为了谋利，把卷一、卷二、卷三私自改为卷上、卷中、卷下，以残本冒充全书。宋朝的洪迈就在《夷州志》中记载有类似现象：“绍兴十六年，淮南转运司刊《太平圣惠方》版……募匠数十辈……嗜酒懒惰，急于求成，将字书点画多及药味分两，随意更改……”

关系人命的药方，刻工竟然也敢任意更改，何况其他！中国古代的图书

馆学家们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他们因聚书较多，所以对藏书做了大量的校订工作。大多数的图书馆学家精雠密勘，使得校雠之学兴盛起来。他们补残正缺、通释典鬻，或校勘异文、疑古求真。例如宋敏求、晁公武、黄丕烈等人都以校雠精慎而著名。而王钦臣每得一书都用废纸草传之，又求别车参校，校正之后才正式誉录。

明朝末年，汲古阁的主人毛晋刻书，好征求宋本。当时有人质疑毛晋说：“不过是为了读书，何必一定要求宋本？”他则回答说：“不读宋本就不知唐诗的‘种松皆老做龙鳞’之误为‘种粉皆做老龙鳞’。”

这些图书馆学家通过如此精勤地校勘图书，减少了劣本、误本的流传。这是他们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所做出的又一贡献。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家的藏书，有的搜求尤舟，复增充栋；有的乡邦征献，博古蒐学乃至集大成者；有的好学敏求，跋涉千里或登门惜读，或辗转借抄连录副本；有的辑为丛书，化秘籍公为天下；有的毕生以抄诵秘鬻为事。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家的私家目录，便是他们藏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私撰目录肇始于《七略》与《七录》，它们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文献。隋唐时期，目录编撰继续发展，但这个时期的私家目录流传下来的很少。宋朝到清朝，图书馆学家私刻目录有了较显著的发展，私人编目之风颇盛，传世的数量也最多。其中以宋朝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为后世所推崇。《郡斋读书志》所著录之书，有两万四千五百多卷，为后世整理古籍、考辨存佚的重要依据。《直斋书录解题》剖立了书目使用解题和记载版本资料的体例，为解题目录的典型，在清朝《四库皇书总目提要》编成之前，无一部官修目录的质与量能及此书的。

在中国古代，官府藏书比较集中，但一遇到朝代更迭、战乱，就很容易使藏书损失殆尽。例如，西汉末年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唐朝“安史之乱”时期，使得唐都长安以及洛阳几次遭到破坏，当时的官藏“乾元旧精，亡散殆尽，足简不藏”。

当时的私人图书馆学家藏书多则上万卷，少则数十卷，收藏比较分散，不易同时被毁灭。一旦官府藏书受到严重破坏以后，统治者便大肆在民间征集图集，私人图书馆学家的藏书便成了补充官府藏书的一个重要源泉。例如，《汉书·艺文志·序》中记载：“攫兴，改秦之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之世，书缺简雕。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出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又如，隋朝初年，私书监牛弘向隋文帝上《请开献书之路表》。他说：“夸私藏见书，蠹尾披览。但一时载籍，须夸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广征藏书，献书一卷，责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由此，民间藏书不断上献，官府藏书很快便充实起来。

在中国古代，很多私人图书馆学家私自刻印图书。私刻亦称家刻，是指私人出资校刻刊书。由于刻书人往往名高望重，所以对于书本会进行精细的校订，或选择优秀的版本底进行翻刻。因此，他们私刻的图书质量一般是比较高的。例如，宋朝廖莹中世采堂所刻的《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和《河东先生集》四十四卷。两书版式相同，被藏书家推为宋刻上品。又如，明朝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毛晋本身也是一位著名的私人刻书家，自明万历年间至清同治四十余年里，他刻书达六百余种，书版多达十万九千多片，其中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六十种曲》《津逮秘弗》等最为著名。这些图书馆学家用自己的收藏为雇本，对书籍进行封印，从客观上对书籍的流传、收藏和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家们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兴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周朝的老子

老子，是人类最杰出的名人之一。美国数学家麦克·哈特在与各方面专家广泛交流意见并参阅了权威性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一书。他在书中列出了一百位世界名人，并按其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力的大小排出座次。值得我们海内外华人自豪的是，在这一百位名人中，有八位是炎黄子孙。其中，老子被排在第七十五位。老子留给世人的《道德经》，虽然是仅仅五千言的一本哲学书，但在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

据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人。署名西汉刘向著的《列仙传》则说老子字伯阳，陈国人。道教认为，“聃”和“伯阳”都是老子的字；至于其籍贯，或属之陈国，或属之楚国，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冲突，苦县本属陈国，后来陈国为楚国所灭，故苦县又属楚国。关于老子的出生年代，《史记》中没有记载。《列仙传》中记载老子生于殷时。道教典籍，如唐末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北宋贾善翔的《犹龙传》、南宋谢守灏的《混元圣纪》都说老子生于殷朝第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岁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时。唐朝尊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唐玄宗开元三年诏以二月十五日老子诞辰为玄元节。唐武宗继位后，又敕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休假一日。可见，老子的圣诞为二月十五日，曾被唐朝政府所确认，并被定为公共假日。

据道教典籍记载，老子于周文王时任守藏史，后来迁为柱下吏。儒家始祖孔子曾师事老子。这在《庄子》《礼记·曾子问》《孔子家语》《史记》等书中都有明确记载。孔子到周王室所在地洛阳去，曾向老子求教过礼。老子告诉孔子：“一个了不起的商人，深藏财货，而外表看起来好像是空无所有；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内藏道德，而外表看起来好像是愚蠢迟钝。你要去掉骄傲之气和贪欲之心，这些对你没有益处。”

据《史记》所载，孔子以“其犹龙乎”来赞叹老子的高深莫测，而后来道教的许多原理也渗入了孔子的学问中。周衰落之际，老子辞官离去，经函谷关时，关令尹喜恳请他著书传世。于是老子写下了五千余言，这就是《道德经》。《道德经》的核心思想就是“道”。在中国文化史上，“道”的最初含义就是我们所走的路。《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后来道的含义逐渐扩大，自然与人事所遵循途径，即规律皆称之为道，遂有天道、人道之说。至老子，始将“道”提升为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老子之“道”，兼有宇宙的本原、万物存在的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修养的最高境界等多重含义。自从老子赋予“道”以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道”就成了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道与德密不可分，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道是德的根据，德是道在事物中的具体表现。

古人说：“道之在我之谓德。”道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人的德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符合道的要求，就是有德。反之，就是无德。故老子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的基本特性就是自然和无为。

老子说，“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所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指事物自己如此而没有外力强迫的状态。所谓无为，就是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而不强做妄为。自然是事物的理想状态，而无为则是保持这一状态的方法。老子希望人们以道为榜样，按照自然、无为的原则处理一切事务。道的运动方式就是“反”。老子说：“反者道之动。”由此，老子总结出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柔胜刚，弱胜强”等具有深刻

辩证法思想的格言。在《道德经》中，老子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他认为统治者应当顺应民意，体恤民情，他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充分反映了老子的民本思想。老子反对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不合理现象，主张帮助弱势群体。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意即，有道者不会炫耀武力或发动战争，而是主张和平。

《道德经》在古代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最早的版本是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本《道德经》，抄写时间为战国中晚期。其次则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道德经》，抄写时间为汉朝初期。历史上流传最广的《道德经》版本则是河上公本和王弼本两种。河上公本属民间系统，文句简古；王弼本属文人系统，文笔流畅。其他有价值的版本还有唐代傅奕本《道德经》、唐代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郭煌唐写本《道德经》、石刻唐玄宗注本《道德经》、南宋范应元本《道德经》等。历代注释《道德经》的著作不下千种，比较有影响的有汉代河上公注、魏王弼注、唐成玄英注、宋陈景元注、王安石注、苏辙注，清魏源《老子本义》等。引人注目的是，历史上还有五位皇帝亲自为《道德经》做注，他们分别是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

老子及其《道德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先秦时期，先后有杨朱、列子、庄子等继承和发扬老子思想，从而形成了道家学派。战国末期的道家将老子与黄帝联系起来，形成了黄老之学。两汉之际，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思想与方仙道的神仙信仰相结合，形成了黄老道，老子被视为道的化身。东汉明帝、章帝之际，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云：“老子者，道也。”桓帝延熹八年，陈相边韶作《老子铭》，说老子“与三光为终始”“自羲皇以来，世为圣者作师”。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在巴蜀鹤鸣山创立天师道，尊老子为教主，以“道”为最高信仰，奉《老子五千文》为经